

县富论与 科学管理

傅志康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左二)、雅安地委书记杨水源(右二)、荣经县委书记傅志康(左一)、县长李远德(右一)在荣经县天凤乡槐树村视察工作。



中共荣经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等领导成员,在县委荣获四川省委授予的“学习、团结、勤政、廉洁”“四好”班子时的合影。

荣经县委

求
實
創
新

許夢俠
九二八

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许梦侠给荣经县委的题词。

序

探索县域经济的发展，走富民裕县兴旺之路，不仅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也是我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五年前，我著《县富论》一书，通过对我可爱的家乡宝兴县的剖析，提出了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指导思想、战略重点及战略措施，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好评，该书荣获雅安地区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一些领导、学者、同行纷纷来信索要此书，希望能再版问世。我考虑再三，还是尽力用实践来回答为好。基于此，现在把我曾经生活过的第二故乡荣经的工作体会汇编成册，作为续集奉献给读者。

诚然，实践和行动是第一位的，记叙和报道这些行动是第二位的。如果没有荣经人民齐心协力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我就不可能有这些记叙和记者们实事求是的报道，而且也不能形成这本集子。当然，对于我来说，著书立说就是想要产生一点社会效应。我既不为利，也不为名，作为人民公仆、一个业余写作爱好者，真正要作出一点奉献，就不仅要竭尽全力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为丰富物质财富添砖加瓦，而且还要时刻向人民交心，挤出时间，勇于拿起手中的笔为创建精神文明财富挥笔讴歌。只有这样，才能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作出一点贡献。

我自己是长期从事基层工作的，这些年来，在实践和学习中取得了一些认识上的长进。但是，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离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要求还差得很远。真是学到用时方恨

少。收集在本书中的文章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值得探讨的地方，甚至还保留着一些传统思想的烙印。愿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同有志于追求真理、振兴中华、实现富民裕县的朋友们共同切磋。

——1995年4月20日

于中共四川荣经县委

前 言

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我国得以迅速发展，只是近十年的事情。从中国区域经济学与县级经济学会成立的那天起，我就尽力为之操劳、奔波……当我看到区域经济学和县域经济研究在神州大地开始开花结果，心里不禁感到由衷的高兴。

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党政干部，怎么走到区域经济学界去研究县域经济了。是的，连我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自问：我是怎样和区域经济学联结在一起的呢？过去，我根本没想到自己要从事理论研究，更没有想到会成为“四川省县级经济学会”会员和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建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我既不是专家、教授，也不属学者、名流，甚至谈不上对区域经济有什么专门研究。然而，我却不能掩饰自己对区域经济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与区域经济学息息相关，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的爱好，而是根据自己多年来做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确确实实把县域经济研究当成我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了。

我是一个从事地方工作的县委书记，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是较早接受区域经济学的热心读者之一。我总觉得，理论不能脱离实际而孤立存在，同样，实践也要有理论来指导。特别是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迎接新技术革命的现代化进军中，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携手共事，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召唤，是改革的选择。我从来没有把理论研究看成只是专家、学者的事情。理论工作者探索未知世界，我则把已知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换句话说，我把在实践中验证区域经济学原理看作是自己的“天职”。因此，我和理论工作者站在一起，并不感到拘束，反

倒觉得有许多共同语言。如今，我始终坚持以实际工作者“自居”，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与专家、学者们共同商讨理论问题，反而觉得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尤其是经过长期的交往，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需要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也需要我！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作为同行都有共同的想法。

我之所以成为区域经济学的忠实研究者、实践者，或许是我过去的经历，特别是从大山区农村坎坷的经历中磨炼出来的性格有关。

执著地追求真理，献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加快区域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建设步伐，实现富民裕县，达到民富国强，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是我始终不渝的理想，也是我努力奋斗的目标。

我有着与他人共同的志向，也有与他人不同的性格。

我生活的四十个春秋，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学习，老老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工作，勤勤恳恳地奋斗……进入不惑之年也是依然如此。

有人说，人老了爱回忆，可是我没有老，却越来越爱回忆。

渴望知识，情深经济建设事业

我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求知欲。

1954年，我出生在四川省宝兴县五龙乡团结村瓦西山上一个农民家庭。在那穷乡僻壤的高高山上，家庭贫寒的环境条件，已注定了我要上学将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尤其是幼年丧母，深感痛苦和彷徨。记得小时候，为了供我上学读书，爸爸、妈妈宁可过着清苦的日子，省吃俭用，积攒学费。这样，我就断断续续地上了五六年的学。少年时代是长身体、长知识、培养高尚品行、情操和良好气质的关键时期。贫贱忧寂，固然不是自己故意追求的

东西，但它确也可使自己产生强烈的危机感，懂得如何勤奋、自己拯救自己。

特别是我在读初中时，正遇上“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疯狂、愚昧的时代，自己曾经热爱过、崇拜过的许多美好事物，都遭到了粗暴的批判。当时有一个荒唐的口号，叫做“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一个可怕的不光彩的头衔，常常和“反动”、“资产阶级”这样的帽子连在一起。自己在那个年代中被剥夺了继续上学受教育的权利。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高中，却因“政审”过不了关，只好当“回乡知青”。我当时所处的是怎样的一种环境呢？我住在一个山岗上的小屋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白天和农民一起干活，晚上只能独自一个人精疲力尽地对着一盏飘忽不定的油灯发呆……物质的贫乏，肉体的劳累，这些都还能忍受，最使我感到痛苦的，还是精神的空虚。当时我正当求知欲很强的年龄，多么希望能读书，能对辽阔的世界和浩瀚的人世有更多的了解啊！然而我的周围却一无所有，既没有学校，也没有教师，更没有书籍。我曾经用这样的诗句表达我当时那种怅惘无望的情绪：“我是一只孤独的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天阴阴山秃秃，何处是我归宿……。”

然而我并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吓倒。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和彷徨后，我终于找到了和环境（也可以说是命运）抗争的途径。这途径是什么呢？一是读书，二是写作。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看书，是我艰苦劳累生活中的最大享受。在书海中遨游，使我忘却了孤独和烦恼，我能够在书中看许多渊博风趣而有教养的人谈古论今，想象和思维的羽翼能飞抵一切领域。读书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思想。除了读书，写作也给了我极大的乐趣。我充分利用办“团结报”的机会，白天把工地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晚上废寝忘食地赶写稿子，有时是发一段议论，有时也写诗，为宣传好人好事，鼓励先进尽一点力。这些文字，现在读来

感到非常真实，没有任何功利的色彩，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写作不仅逐渐提高了我驾驭文字的能力，也使我养成了勤于思索的习惯，因为写作总是和思索连在一起的。当时，面临农村失学儿童较多，我勇敢地承担起教书育人的任务，一方面上课，一方面修建学校，虽然苦些累些，但看到正在茁成长的少年儿童，个个天真活泼，心里也就感到乐滋滋的。同时我还担任了团支书，面对少数青年不安心山区建设，想到平坝去安家乐业，我们开展“安心山区，建设山区”的大讨论，从而使广大青年安心山区建设。团支部的工作得到了党组织和上级团委的肯定，我被选为四川团省委委员、雅安团地委副书记。

我认为生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自己来创造的，不愿意去创造的人，哪怕环境再优越，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文革”摧毁了我学生时代的求学梦想，却锻炼了我刚强的意志；我曾经在一篇描绘当初如何和环境搏斗的小小散文中这样感叹：“在黑夜中寻觅到的光明，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在狭窄中追求到的辽阔，是永远不会缩小的。在贫瘠中创造出的丰饶，是永远不会枯竭的。在逆境中勇于奋起的人，是永远不会跌倒的。”这是肺腑之言。我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这段经历，没有在那盏微弱的油灯下度过的无数个漫长的黑夜，也许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人生莫惧少时“贫”。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尔成。”我的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贫贱忧寂的生活，激发自己奋发向上，经过千锤百炼，终有所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环境锻炼之后，不仅使自己具有坚强的意志、吃苦的精神、实干的本领，而且培养了自己尊重他人，珍惜时光，勤奋工作等优秀品质，培养锻炼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竞争意识，对后来适应社会，有所建树，帮助甚大。特别是在1973年到1974年，我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习马、恩、列、斯原著，开始奠定了我的哲学思维能力的基础，初步增强了如何辩证地、历史地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975年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坚持从村实际出发，制订了山、水、田、林、路齐治理的规划，一个冬季把公路修到了半山腰上，初步解决了山区农民长期背篓的历史。同时，建立了大队农村合作医疗站，使山区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得到了改善。特别是大旱之年，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奋力抗灾，从而获得了粮增产钱增收的好成绩。年底我被调到公社党委工作，我知道自己肩负的重量。我认为只要认准了目标，无论遇到多少曲折，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坚持党委一班人团结奋战，大家深入到队，住到农民家中，同干部群众一起起早摸黑劳动，苦干三年全公社的面貌定会得到改变。1978年底，县委调我到团县委工作，有幸去首都北京中央团校学习，参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转变，有了清醒的认识。当我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亲耳聆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真是倍感光荣和幸福，更加明确了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坚定了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信心和勇气。

中央团校学习毕业后，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宝兴县。人生不易，带领群众斗穷达富，这才算不白活一世。宝兴，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山区，离成都230公里，全县5万人，面积却有3114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6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大山区县。全县山高谷深，沟壑纵横，高低悬殊，地形复杂，农村农民生活尚未处于温饱状态。两家餐馆，几家小商店，土木结构的瓦房形成小县城的轮廓。全县交通不便，能源紧张，人才奇缺，信息不灵制约着宝兴经济发展。80年代初，我任中共宝兴县委常委。当时，全县农村改革已进入农业生产责任制由包产到组再到联产承包的摸索阶段，究竟怎么搞？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有用同志安排我在盐井乡十九队搞试点。该队的生产实行联产承包的

生产责任制后一年翻了番，对全县搞农业生产责任制很有说服力。1983年全国地方县级机构改革后，我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深感责任重大，凭着一种拼命干工作的勇气，竭尽全力，为人民多办实事，好事，真正取信于民，从而较快地适应地形势发展的需要。1985年初，组织上决定由我主持县委工作，我坚信：大自然是奇异无比的，也是公平的。山区是最贫瘠的地方吧，可它地上生长地下埋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宝兴难道只有穷，就没有宝吗？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爬山坡，进深山，徒步翻山，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一些地方人迹罕至，没有地名，当地的农民就叫它“傅书记去过的地方”。夹金山下，中岗山上，黄店子沟，芭蕉湾队，我每次进去，农民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搬来凳子，坐在屋前，烧好开水，煮好腊肉等我，那情景真是感人至深！我不为家乡的乡亲们“卖苦力”，我“死不瞑目！”

功夫不负有心人，真是“踏遍青山人未老”，生在宝中也知宝。原来宝兴遍地是宝。山沟里有宝，宝兴白大理石储量为533万立方米；河里有水，宝兴河可供发电的水力为94万千瓦；坡上有树，森林面积达137万亩；地上有各种名贵药材，被称为“神药之区”。于是五大系列的开发在宝兴形成：围绕以大理石为龙头的矿业开发；以种、养殖业为主的农业开发；以峰桶寨自然保护区为主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宝兴人一看到这五个开发，群情振奋，短短的三年，“三头”（石头、水头、木头）开发带来了建材业、运输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稳粮增收的积极性。在乡镇企业的第一个春天里，全县实现过一年翻番的光荣历史，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增长，东西两河的公路得到了整治加宽，两河口丁字型大桥竣工使用，干部带头自筹资金感动“上帝”列上项目的两河口电站，正

进入紧张施工，县城用大理石镶嵌而成的幢幢楼房不断崛起，宝兴县城被人民称为“袖珍县城”。

在实践中，使我深深地感受到，兴趣和爱好不等于科学态度，热情和实干不能代替理论水平的提高。实事求是地讲，自己多么需要理论知识、科技文化知识来充实头脑。特别是工作上的所谓某些“失误”，深深地刺激了我，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时至今日，回想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反思之后，我暗暗地下了决心，我要重新用理论知识武装自己，我渴望能掌握理论知识和现代化科技知识，盼望着能有个求学的机会，但每次都因工作需要走不开而被迫放弃了。

1987年初，听到了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党校招收大专班的消息，我欣喜若狂，立即向上级领导提出了求学深造的书面申请。我宁愿放弃优厚的待遇和领导职务而去求学，没有坚定的信念是做不到的。上级领导被我的求学诚意所感动，批准了我的请求。同年秋，我终于考取了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党校政治经济专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我终于赶上了这趟“末班车”。因此，在校期间，我十分珍惜和紧紧抓住难得的机遇，拼命地汲取知识营养，刻苦地攻读理论原著，认真钻研现代科技知识，联系思想实际，认真进行消化，从中汲取营养。说来也很有意思，由于自己读书如拼命，不仅每期中途未请假，而且还充分利用寒暑假搞社会调查，挤时间自学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决策学”自学考试。大山区工作磨炼出来的性格，使我一往直前。坚强的恒心和毅力，不仅使我比较扎实地完成了学业，而且还撰写了《县富论》一书。经过刻苦努力，自己终于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了“优秀学员”的称号，同时，《县富论》一书还荣获“优秀科研成果特别奖”的殊荣。两年党校生活的熏陶，自己在党性、知识、能力方面都有明显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得到增强。随着知识面的扩展，自己学会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求实的科学态

度、严谨的工作作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用理论知识、现代科学知识充实的大脑。

党校学习毕业后，县委领导传达上级组织的意见，让我任宝兴县委副书记。上学前，工资上我拿正县级待遇，上学后，反而是副县级，这似乎是“降职”了。可是我当时却没有理会那么多，我不再乎一官半职。我只想能让我发挥专长，能让我在县域经济的岗位上一展宏图，能让我实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富民裕县的抱负。至于任什么职，对我来说无所谓。我为的是干事业，不是为当官，不然的话，我又何必弃职去学习呢？我认定了“为党和人民干事业，是督促自己前进的力量源泉”。不久，我奉命到四川省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县之一的荣经县委工作，主管农村经济工作，我把心思放在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与管理上，虽然面对千家万户，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但工作起来心情非常愉快。1991年初组织上任命我为荣经县委书记。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要总揽全局，抓好发展，不仅自己要学会辩证地思考问题，也要教育干部和党员这样做，即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正确地分析事物，认识事物，找出办法，真抓实干，取得成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刚到荣经工作时，就有人说，荣经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饿死过人，干部挨过整，全省出了名。而今农业上是水稻稻瘟病的病窝子，工业企业亏损，县城不足2平方公里，有一家瓦屋酒家，有几家国营和个体小商店，矮矮的瓦木屋构成一条不足2000米的县城街道。

不用说，在这儿当县委书记，要苦拼、苦干。

比如有人说挖煤炭风险大，成本高，效益低。我认为，对优势要辩证地看，优势和劣势，也是比较而言的。思想方法对了头，工作跟上去，劣势也会逐渐转化为优势。我和县上的干部一起，深入群众，认真求方问计，脚踏实地研究县情，终于找到了荣经在发展经济上的几大优势，即土地、石材、煤炭、水利、林

业、茶叶、长毛兔等资源优势。县委、县政府确定了：“以农立县，以工富县，科教兴县，依法治县，富民裕县”的经济发展思路。坚持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狠抓石材、煤炭、电力、森工、茶叶、长毛兔六大系列开发，力争把荣经建成石材、煤炭、林业、电力、茶叶、长毛兔基地县。在工作中，抓住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个龙头，紧紧依靠各级干部率领全县人民团结一致，真抓实干，从而使系列开发上了一定的规模，走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的路子，广大群众从中得到了实惠，在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中，为实现富民裕县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积极钻研，热心科研活动

我愿为研究县域经济和党的建设献计献策。

70年代中期，我曾参加一些经济研究和应用技术的推广活动。如高山区杂交玉米的播种与推广，旱地玉米采用蓄水喷灌，确保稳产高产等。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很有实践意义的活动，既使粮食稳产增产，又使先进实用技术得到了推广和运用，更重要的是使自己初步掌握了一些实用技术知识，真是受益匪浅。

进入80年代后，我一如既往参加科技活动，特别是对高山如何趋利避害，使玉米作物躲过升温迟降温早的灾害性气候进行了研究。在宝兴县工作时，我们由小型实验到大面积推广玉米地膜种植和肥团育苗移栽，使玉米单产大幅度提高，先进技术的推广使干部群众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在荣经县如何防治水稻稻瘟病，我们发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推广并抓住用“三环唑”浸秧的关键环节，结果使水稻连续六年稳定增产，为山区防止稻瘟病摸索出了一套比较成功的经验。

“以文会友”是我在学习和工作中尝到的甜头。那是在80年代末，省委党校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时，我都积极参加。

开阔视野，启迪思路，从中获取到新的知识，许多观点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仿佛是在“以文会友”。这使我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有关经济管理科学的学术活动更是倍加关注，这使我掌握了先进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为后来研究区域经济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1990年10月我有幸参加四川省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授奖大会。会上，我的《县富论》一书，经逐级推荐和有关专家教授的评审，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研成果三等奖。我已经进入了理论界这个被大多数实际工作者称之为“神秘王国”的领域了。后来我在和许多理论工作者接触与交往中，结识了许多的挚友。

我与社会科学和区域经济研究最深的接触得益于一次学术会议的契机。因为荣经县是四川省县级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县之一，并且在经济发展中收到了实效。上级经常安排我们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或学术交流活动。1990年11月上级通知我去参加在广东召开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与发展、科技与经济讨论会”，这正是我一直关心的议题。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前往赴会，没想到从此会竟与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秋高气爽，鸟语花香，恰是江南好时光。会议在广东中山市召开，借此机会，我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并聆听了孙中山先生当时出国归来唤醒民众的讲话录音，使我坚定了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勇气。我漫步在中山路上，一方面留心领略那让人陶醉的景色，一方面总是想如何在会上阐述自己的观点，想着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会议期间，我尽可能地和大家交谈，生怕错过这次“取经”、“探宝”的好机会。社会科学与区域经济，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命题。长期以来，搞经济工作的不懂得社会科学，搞社会科学工作的不研究区域经济，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们似乎也习以为常了，社会科学研究与区域经济研究相脱节，这正是我们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症结。我觉得

应结合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使理论探讨与实际体验之间能够勾通。基于此，我联系荣经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撰写了题名为《从根本制度上看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的论文，并在会上介绍了我们县这些年的做法，用实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特别是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和广东、上海社科联负责同志听取了我的发言颇感兴趣。会后一些教授找到我交换看法。我觉得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聚会，一起探讨社会科学 with 区域经济中的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问题，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两者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再说，许多理论工作者是从实际工作中转变志趣的，既搞理论研究又做实际工作的也不乏其人。不过，我倒不是想成为理论家，我是想运用理论来指导县域经济发展与管理的实践。同时，也想反思之后为理论研究做一些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这样可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少走一些弯路，为走出一条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速度效益型路子而大胆探索，积累经验。

特别是在90年代初，由我著的《县富论》先荣获省政府社科研究三等奖之后，又获雅安地区行政公署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为雅安地区填补了在省上社会科学成果奖的空白之后，更使我感到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任重而道远。因此，在工作的实践中，我一方面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石材工业，一方面深思熟虑后撰写《加快石材发展，振兴荣经经济》的文章，在“振兴雅安经济研讨会”会上交流后，不仅受到与会者的好评，而且提出的建议得到了领导们的重视和雅安报的一等奖。

契诃夫说：人要有三个头脑。天生一个头脑，从书中得到一个头脑，从生活中得到一个头脑。实践中使我认识到，只有勤奋学习、大胆实践、求实创新、总结提炼，才能成为一个坚定、清醒、廉洁、有所作为、有所奉献的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对我来

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十分重视理论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理论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动力，知识是为人民服务的战斗武器，人格是为人民服务的强大魅力，是理论力量 and 知识力量的支撑和载体。中青年干部只有把这三种力量汇于一身，组成合力，为人民服务才能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当然，作为一个党政干部有了三种力量，只是有了成功的基础，还并不等于成功，要成功，还特别需要勤奋，尤其是对于党政领导干部来说，还要有良好的领导艺术。而在诸多的领导艺术中，我觉得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特别重要，工作干好了，有什么经验，工作未干好，有什么教训，经常认真加以总结，会使人头脑清醒。基于此，我在实践中把它列成一个干部成长的公式：忠于理想 + 勤于学习 + 勤于奋斗 + 善于总结 + 乐于奉献 = 成功。在实干的同时，我还撰写了《当好配角，搞好协调》、《县委书记的‘蹲点’与‘泡面’》，并与他人合著《县委书记谈改革开放》、《开拓者》等书籍。

1993年3月，为加快雅安地区石材工业的发展，我随团去意大利考察石材市场及发展前景。归来之后撰写了《意大利归来话荣经，真抓实干求繁荣》，文中明确提出山区要想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变成商品优势打入国际市场，必须坚持让权、让名、让利的政策，对全区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性和实用性的作用。在雅安报发表后，荣获该报一等奖。1994年6月，应香港邓晓兰女士的邀请，我们一行六人去香港考察学习，听取了“亚洲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对策、香港贸易的前景与金融趋势”学术报告。思考之余撰写了《香港行，话荣经》一文，对山区石材、茶叶等商品如何通过边境贸易跻身国际市场，找到了一条比较符合山区实际的路子。与此同时，我紧密结合荣经1992年举行中国四川荣经杜鹃花节，开展了“以花为媒，以节会友，文经结合，促进繁荣”的活动。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的关心、支持下，我们成